

別理論具體應用到京劇研究上，則需要有更多針對研究對象本身的考察。很多材料——比如後台禁忌、旦角的身體問題等——過往學者並非沒有注意，只是因為理論欠缺，解讀失之浮淺。筆者認為*Drama Kings*作為綜合性的研究著作，能夠全面地剖析京劇的性別結構，尤其是與晚清到民國政體的改變聯繫起來，很大程度得益於理論上的完整與系統。

總的來說，*Drama Kings*全書貫穿始終是流動的歷史。裡面真實可感的人事、生活，以及各種變化的緣起，地域差異，以至回流分化變易，都還原了歷史的曖昧與曲折。其中跨學科的思維也顯示出很大的優勢。作者的材料收集也較為完備——尤其注意到很多當時人觀戲的描述、重要人物的日記等個別、微觀的材料。儘管在戲劇理論分析的部分觀點，還有書中較少涉及女伶這些細節上，仍有商榷的空間，但此書仍不失為成功的京劇研究著作。

書中提出的擺脫殖民性的問題，對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問題同樣具有啟發意義。現有不少文學史、戲劇史研究，對接近大眾日常生活的文化形態關注不足，而更多着眼在詩歌、白話文等較為精英化的文體。兼之長期在五四運動的邏輯下表述這一過程，又把五四運動的產生歸因於西方的影響。如此一來，所得結論不免構成自身對本國歷史的殖民化。研究過程也失之簡單粗略，難以描述研究對象內部的發展動因，還原有血有肉的人事。*Drama Kings*提出的問題在於，從理論創新回到應用實踐時，什麼是更適合於中國研究的維度？什麼是更貼近中國社會的歷史研究方式？相信這些問題，需要以更多優秀的研究成果去回答。

黎俊忻

中山大學中文系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6，365頁。

美寶送來她的新作《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以下簡稱《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按習慣會順便翻一翻，沒想到這一翻就不能撒手了。有意思的是一本歷史學的書，卻是以人類學的民族志敘事的方法寫作的，一開始就是描述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廣東文物展」開幕場景，然後娓娓地引入她的主題。書看完後，我承諾要寫個書評，可一拖就是一年多。

該書於2006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此書以她在牛津大學的英文博士論文為藍本，改寫而成。程美寶運用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的一些理論來解讀近代廣東的文化觀的形成問題。她認為近代中國「地域文化」的內涵，是在特定歷史時空中的政治對話過程層積而成的。該書透過審視操控着書寫歷史權利的讀書人的「文化觀念」的形成及演進的歷史過程，來探討在權力互動下的地域文化是怎樣被選取並填進某個特定的「地方文化」的框架中。廣東知識份子對廣東地方文化的表達與標榜，實際上是地方上的讀書人在國家意識和地方關懷的二重奏中，不斷加入自己的聲音，用自己界定的地域文化來表達他們心目中的國家觀念，在中國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之間建立起辯證統一的關係。她得出結論：「所謂的『廣東文化』，只是以行政界線劃分的一個範疇，至於裏面填塞了什麼內容，除了順應國家文化的定義的改變而更替外，也是在這個地域範疇裡活動的人群角力的結果。」（頁313-314）

在此書中，她從歷史敘述、種族血統、學術傳承、方言寫作、地方民俗等側面，考察從晚清到民國年間「地域文化」（「廣東文化」）觀念如何形成的歷史過程。全書以嶺南思想文化與學術成就、族羣文化、民間民俗為三大主題，確立其「廣東文化」的基調，在結構上分為七章。

第一章導言部分。在導言中她強調該書不是「一個地域文化的研究」，不是「一個純粹的『觀念史』研究」，不是「一個地方史的研究」。而是「企圖以『廣東文化』為例，嘗試把清末以來中國的『地方文化』視為一個命題、一套表達的語言來看，探討在不同的時代，在怎樣的權力互動下，不同的內容如何被選取填進某個『地方文化』的框框。」作者無意於地方史研究，以廣東文化作為一個個案，試圖提出的是一個便於理解晚清以來中國地方文化觀形成過程的分析框架。其實，這一章既是本書的核心，也是宣言。因為長期以來，歷史的研究把中國視為一個整體，地方的歷史只是填充整體歷史中的空洞。而本書認為所謂中國的歷史是不同地域文化構建的。換言之，沒有地域文化也就無所謂國家整體的文化！這是一種從新的視角研究地域文化的宣言。

第二章嶺外入中國。作者利用了清代以來的廣東地區的鄉土志以及鄉土教材，觀察「地方」歷史的敘述是如何體現「國家」的存在。作者從歷史材料中對粵人的界定開始，延展到對粵人的教而化之的問題，進而討論隨之出現了由各地方的鄉土志為基礎的數種鄉土教科書，而鄉土教科書出現的背景則與國家理論和制度的變化有着密切的關係，因而將「鄉土」和現代意義的

「國家」觀念聯繫在一起。

第三章書寫粵語。中國的方言繁雜，廣東人使用的粵語出版物在其生活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在廣東人的心目中，粵語寫作的地位仍是處於邊緣的。雖然在清末到民初這一特定時期，粵語成爲維新革命的標誌，幫助革命份子建造新的國家觀念，但是當國家真正建立後，粵語的發展卻仍維持其「方言」的從屬地位，並沒有發展成一套全國通用的「文體」。作者在這一章中，以粵語寫作在娛樂、傳道、教育婦孺中的使用，來探討地方語言在讀書人心中角色，以及在近代中國國家概念形成的過程中所經歷的微妙變化。

第四章追溯嶺學。作者集中描述了道光年間至清末在廣東具有領導地位的學術機構學海堂，並刻劃了阮元、陳澧、朱次琦、溫肅、陳伯陶等士人形象，藉以表現晚清在國家和地方層次上發生的社會政治變遷，以及在這時候興起的新的國家觀念，是如何挑戰原來的廣東文化代言人的權威，證明了政治力量、經濟實力對文化、學術的影響。作者選擇了對晚清以後廣東學術傳統有着深刻影響的學海堂爲研究對象，是因爲她認爲「學海堂實際上是晚清廣東的政治中心。誰被委任爲學海堂學長，其學術取向和成就固然是重要條件，但其政治立場和在地方上有可能得到的支持，也不容忽視。全國所認同的學術標準固然是決定誰足以爲廣東文化的發言人的基礎，但廣東的內部政治，對於如何定義當代和以後的廣東文化，也起着關鍵的作用。」（頁180）並且，「學海堂學長和學生既寫就了廣東的學術史，他們的子弟和弟子又爲他們在史冊上留下芳名。」展現了他們如何爲廣東文化爭取學術地位和資源的過程。這些接受西學的學海堂成員，爲尋找取代舊文化的新文化，爲建構一種新的國家意識，他們從城市走進鄉村，重新定義地方文化，給廣東人和廣東文化增添了新的詮釋。

第五章由民俗到民族。承上一章廣東知識份子所感到的迫切焦慮，「到群眾中去」成爲他們的理想，「地方」和「農村」成爲他們關注的興趣所在，因而漸漸發展出「民俗學」這一研究領域。作者認爲民俗學運動成爲建立民族主義的政治文化意識的重要一環，首先對民俗學在中國和廣東進行了綜述，繼而對中山大學的民俗學研究以及客家人文化認同進行了縝密的分析。由於學術與政治的密不可分、學人與政要的身份重疊，使得民俗學研究最終走向爲營造國家民族意識服務的道路。

第六章舊人新志。在本章中，作者選擇分析《高要縣志》的纂修這一個案，嘗試說明地方文獻在編纂的過程中，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思潮對其的深

刻影響，以及地方文獻的編纂者又是如何維護和認同地方利益，地方觀念和國家觀念的共存和融和，在理念的層面得到妥協的體現。

第七章餘論：文化展覽背後。作者將視野又轉回本書開篇的1940年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將此會的開辦置於更廣闊的歷史脈絡中。她詳細介紹了組織者的構成，對葉恭綽、簡又文的經歷和社會地位進行分析，認為「『文化』並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客觀存在，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過程中建構出來的一種觀念。」（頁306）進而，她重新省思「文化」是什麼？「廣東文化」何在？並對地域文化研究進行了再思。作者反對二元對立的「基層／民間／地方vs.國家／官方／中央」的分析框架，認為只有從認同並定義着文化的人們的眼光和世界觀出發，將自己的價值觀從研究對象抽離，才能更準確的定義和理解這些地域文化中的人物和他們身處的時代，才能發現中國文化最誘人之處在於「這種實際上多元而在表述上又趨向統一的辯證的國家地方關係」。（頁317）

中國的地方史研究目前已構成了一個熱點現象，程美寶運用了「現實的建構」（*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分析取向，從「地方性知識」出發，把「廣東文化」作為一個命題，放在歷史語境裡構建出自己細緻理解中國社會的中層解釋框架。探討在不同的時代，在類型各異的權力支配下，內容是如何有選擇性地被填進「廣東文化」的框架之內，「廣東文化」如何被整合進民族——國家建構中，並使原有的內涵發生轉換。程美寶的著作體現了相當的理論創新和扎實的史學功力。此書被納入由桑兵教授主持的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體系研究出版計劃中，該項研究計劃的目的是要以宏觀作為探究的工具，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理解近代，重返歷史現場。程美寶的《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一書，則正是從廣東的地域、文化、知識份子等小處着手，而放眼於近代中國的國家觀念是如何從「天下」轉移到「國家」以及近代「地域文化」話語建立的過程。該書不僅契合研究目的，亦代表了國內年輕歷史學者的較高水準。

周大鳴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